

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以近代中国社会中心力量转换为中心的考察

王续添 辛松峰

内容提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和社会中,从古至今都存在一种居于中心地位、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心力量。作为中心主体,它通过对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的形塑,构建了一种中心主义的国家形态,也因之成为中国这个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机制。晚清之际,在士大夫分化蜕变后,近代军队以其现代性和组织性暂时充当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心力量,实现了社会中心力量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次转换,即从士大夫到近代军队的转换。民国成立1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崛起,使社会中心力量由近代军队向政党的转换成为必然。但是,国民党取代北洋军事集团,仅是社会中心力量从传统到现代第二次转换的过渡阶段,即半政党半军队阶段;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才完成了社会中心力量第二次转换和中国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转型。两次转换都体现了中心主体、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的变革和发展,清晰地彰显出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变迁逻辑。社会中心力量的存在及其转换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乃至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本文尝试为理解中国政治给出一种贯通式、整全性的新解释,为认识国家现代化的多样性和普遍性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社会中心力量 中心主义国家 现代国家 历史逻辑 历史政治学

作为超大型政治共同体,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始终受到学界关注。无论冲击-回应说、根本议程说,还是军事-财政国家说等^①,都从不同角度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但也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采用历史和理论结合、时间和结构互嵌的历史政治学研究进路,通过对中国政治史和国家史的宏观考察,梳理和阐释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演进中的关键作用,分析和说明这一转换何以成为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机制。换言之,本文的学术关切在于历史地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演进抑或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何在。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国家史研究”(19XNL002)的研究成果。

① 费正清、邓嗣禹:《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联书店,2013年版;哈尔西:《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一、社会中心力量和中心主义国家的理论阐释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①这就是说,社会和社会结构是认识政治和国家的前提与基础。一方面,自然形成的“社会”通常比人为建构的“国家”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社会先于国家出现,国家则在社会之上构建起来,什么样的社会往往塑造什么样的国家。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认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与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旗鼓相当,或者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多一些。”^②因此,对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从社会结构及其属性中发现作为社会主体也即国家构建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其中的主导性力量及其变化的作用,无疑就成为阐释和解决这一政治学重大问题的关键。在此,借助既有的学术和思想资源,相应地提炼和阐释新的概念——社会中心力量与中心主义国家,建构全新的分析框架,就成为分析中国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历史嬗变的理论前提。

(一) 社会中心力量

无论古今中外,一个社会内部总会存在诸多社会力量或势力(social forces)^③,它既可以是特定人群,也可以是某种组织或权威。晚近以来,作为观察社会的结果,一个新词汇——中心力量或中心势力,越发得到广泛使用。梁启超的“兴绅权”^④、胡适的“中心的阶级”^⑤、钱穆的“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即“中心的指导力量”^⑥等概念,都表达了类似含义,而常燕生、李大钊不仅明确指出“中心势力”的缺失是近代中国内乱不止的重要原因,还提出了“创造中心势力”^⑦的构想。梳理和综合“中心力量”或“中心势力”的使用情况,其含义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某类群体或阶级,如士大夫、武士、无产阶级等;(2)某种无形力量,如天命、宗教、权威等;(3)某种行业,如农业、工业、新闻传播等;(4)某种团体或组织,如工团、政党、国家等。^⑧这说明,中心力量或势力的概念是宽泛和模糊的。有鉴于此,本文使用“社会中心力量(central social forces)”一词并加以界定。社会中心力量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居于中心地位,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并借助一定的制度形式,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到引领、指导或支配性作用的群体或组织;与之对应的其他群体或组织,则是社会非中心力量。

本文从国家权力由哪个群体或组织掌握这一根本问题入手,考察社会中心力量如何形塑不同的国家形态及其对国家发展所带来的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换言之,本文从国家权力与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30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② 米格代尔等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③ 英文的类似表述有 social forces 或 social power,前者主要指具体的人或群体,后者更多指权力或权威。本文的社会力量实际是 social forces,也称作社会势力。不过,英文中 central social forces 的表述很罕见, social forces 的用法更多些。(参见米格代尔等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

④ 《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4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⑤ 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1933年第81期。

⑥ 钱穆:《国史新论》,第32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⑦ 常燕生:《建国问题平议》,《独立评论》,1934年第88期;《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222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⑧ 关于“中心力量”或“中心势力”这几种用法的梳理,笔者参阅文献众多,难以悉数列出,在此仅举数例。迪尔:《探寻中世和近世日本文明》,第165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李福泉:《先秦文化史》,第58页,岳麓书社,1996年版;苏希胜主编:《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第202页,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心力量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中心主义问题。当然,本文的考察与米格代尔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关系的研究仍略有不同,他视国家为一种社会力量,将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放在一起,研究它们的互动与影响^①;本文则关注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不同社会力量对社会中心力量的竞逐,以及社会力量如何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支配来塑造新的国家形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中心力量的出现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瑞士学者内夫(Robert Nef)认为,“将一切集中起来(centralise)似乎是人的一大基本内驱力……具有深层次的人类学根源”。^②英国学者希尔斯(Edward Shils)也指出:“社会有一个中心……社会结构有一个中心圈,中心圈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③实际上,所谓轴心时代诸文明^④都可看作是不同地域的社会中心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典型案例。社会中心力量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凝聚社会成员。社会中心力量是因应社会的广泛团结需要而产生的,聚合作用构成了其基本的社会功能,它将社会成员团结起来,形成整体合力,才能使一个国家和社会在与自然的斗争及敌我冲突中得以存续和发展。(2)维护公共利益。社会中心力量之所以能够凝聚社会成员,是因为它能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就无法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3)维系社会秩序。社会中心力量通过强约束的法律制度和弱约束的道德习俗,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障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4)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发展方向的转换往往带来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系统性、根本性变动,此时的社会中心力量就要擘画全新的社会图景,引领未来发展方向。

(二) 中心主义国家

将上述作用归结为一点,社会中心力量的根本作用就是主导形塑了人类社会的中心主义国家形态。所谓中心主义国家,是指由社会中心力量主导建构起来的以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为基干的国家形态,中心力量的作用也随之渗透到国家各个层级和社会各方面。同理,由社会非中心力量建构起来的以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为基干的国家形态,即非中心主义国家。所谓中心主义政治制度,就是以社会中心力量及制度为本源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制度体系,这个中心力量及制度是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核心和母制度,主导整个制度结构并派生出其它制度;而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就是由社会的多种力量及制度共同产生发展起来的制度体系,没有哪一种力量及制度是核心或主导部分,因此,它是一个多元、多中心而非单一中心的制度结构。^⑤

进而言之,中心主义国家的主要内容和突出特征就在于:(1)中心主体,即社会中心力量。(2)中心理念,即由社会中心力量主导建构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3)中心制度。这是基于中心理念构建起来的国家制度体系的主轴,即社会中心力量如何领导国家的制度,主要包括央地关系制度和社会中心力量领导军队制度,前者是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后者是社会中心力量合法垄断国家暴力问题,可以说,这两者是社会中心力量与国家关系最核心最集中的体现。(4)中心过程,即由社会中心力量主导并依中心制度展开的以纵向为主轴的核心治理过程。这里,中心主体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主导力量,它要持续地吸纳社会精英以维系自身的延续;创制适应国家和社会

①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 罗伯特·内夫:《论非中心制度》,冯兴元、毛寿龙编:《经济、法律与公共政策的规则》,第209—254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 希尔斯:《中心和边缘》,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诸理论》,第21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这个“中心”是社会信念和价值层面的意义,但创造这个中心的就是社会中心力量。

④ 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⑤ 王续添:《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与“中国政治模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

发展所需要的中心理念,并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同时,还要建构和发展出中心制度以激发社会活力,维系社会正常运转;在此过程中,中心过程必须是通畅的,以便中心主体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由此,这些要素便构成了一种完整的中心主义国家形态,所反映的正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中心主义政治模式。

在人类发展史上,社会中心力量是一种普遍性存在,中心主义国家也因此是一种普遍存在。以色列政治学者伊拉扎(Elazar)认为,“每一个政治制度……‘天生地’都有中心和边缘地区”,社会进化的“最终结果往往会造成一个……单一权力中心的政体”^①,这正是中心主义国家的一种具体呈现。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和曾经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典型的中心主义国家,^②而在常被认为多元社会的西方,其早期的古希腊、古罗马等,其实也是一种中心主义国家。“自由民者……是希腊之‘中心阶级’(The élite)、贵族阶级,享有社会的、国家的一切自由与权利,以支配平民及奴隶。”^③在古罗马,“只有自由民有参军的义务与权利”,并参与公共管理,非自由民则被排除在外;^④随着共和国向帝国的演变,军队取代自由民成了新的社会中心力量:它不仅是“罗马的武装力量,还是罗马社会的中心”^⑤,“是罗马帝国的根基”。^⑥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不同的社会中心力量迎来了不同的命运,早期中心主义国家出现了分流。在中、俄等国,伴随社会中心力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中心主义国家实现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演进;而西方的社会中心力量则被非中心力量所取代,贵族、教士、国王、市民等共同成为中世纪“历史的支配力量和主要角色”^⑦。因社会结构会“通过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形式得到典型化的表现”,^⑧中世纪等级会议的出现,更进一步强化了西方非中心主义的社会属性。由此,西方社会遂发展出一种非中心主义的国家形态。近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强势崛起,则使非中心主义国家形态得到大规模推广,逐渐形成了与中心主义国家相对应的另一种政治普遍性。

(三) 社会中心力量转换与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

所谓转换(convert),是指事物发展方向或自身形态的转变与改换,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意味着对前一阶段的某种超越。社会中心力量转换,则是指由于社会内外环境的重大改变,社会中心力量从一种群体或组织变成了另一种群体或组织。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中心力量转换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传统社会中心力量到现代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一种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现代社会中心力量之间的更新换代,但在此转换中,社会中心力量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定位不仅没有改变,事实上还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得到加强。作为最具能动性的主体要素,社会中心力量的变换导致中心理念、中心制度、中心过程的一系列变动,最终推动中心主义国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迁,即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

具体来说,中心主体即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社会结构及属性是社会中心力量避免消亡并得以转换的基本前提。社会由不同的阶级、阶层和不同的

① 伊拉扎:《联邦主义探索》,第16、4页,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第31—4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第1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④ 蒙森:《罗马史》,第34、36、37页,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⑤ 理查德·普拉特、约翰·詹姆斯:《凯撒大帝:古罗马大独裁者的传奇一生》,第40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

⑥ J. M. 罗伯茨:《我们世界的历史1:古典时代》,第280页,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

⑦ 基佐:《欧洲文明史》,第165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⑧ 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第77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群体、集团乃至不同个体构成,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及属性。人类社会因社会中心力量的有无,大致可分为中心主义和非中心主义两大类社会结构及属性。在某些社会由中心主义向非中心主义转变时,另一些社会的中心主义结构及属性则得以延续,这就为传统中心力量向现代中心力量的转换创造了最基本条件。另一方面,社会所遭遇的重大外来冲击则可能成为推动社会中心力量转换的外部动力,因为中心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属性往往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韧性,很难从内部推动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而外部重大冲击则可能为这种转换提供契机。

中心理念的转换,指伴随着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由其主导建构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相应地发生转换,但在具体内容转换的背后,其所反映的中心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却得以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心理念可以说是社会中心力量对国家和社会的认知与理解的理性化乃至理想化表达,集中反映了它们的思想诉求。尽管传统社会的中心力量和现代社会的中心力量会因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不再是一种同质的社会力量,但它们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却未发生改变。它们所秉持的价值理念虽有所谓“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迥异,但其精神内核却有着根本的一致性,在中心理念转换上所呈现出来的只是具体名称、内容和形式的变更,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未发生改变。

中心制度的转换,即伴随着中心理念的转换,由中心理念所生发出来的国家核心制度的相应转换。这种转换是指具体制度内容的转换,反映中心理念基本价值取向的中心制度的精神内核依然得到延续。事实上,无论传统还是现代,中心制度即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单一制和国家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制度。中心主义国家的其他政治制度,往往由这种贯穿国家结构不同层级的中心制度派生而来。在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中心制度的转换不仅为维系国家统一、央地关系以及地方之间关系的协调提供了一种制度纽带,更为其他相关制度的革新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就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建构起一个基本制度框架。

随着中心制度的转换,中心过程即反映中心制度实践效果的核心治理过程,也会发生相应的转换。由于单一制是一种纵向结构制度,中心过程因而表现为一种纵向的治理过程,其转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就是直接治理范围的扩大与程度的加深,即“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普遍特点是面向社会的持续渗透。……因为它经历了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型。”^①一方面,传统国家的直接治理仅限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内地,广大边陲及某些闭塞地区则处在宗教领袖或部族首领等统治之下,中心过程的转换则将这些地区真正纳入国家治理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国家力量有限,即便在内地,直接治理也不能完全深入民众,国家实际上止步于某个层级之外,中心过程的转换则将国家的触角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乃至个人,这就推动了直接治理的纵向深入。

由此,通过社会中心力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中心理念、中心制度、中心过程也相应地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这就为我们理解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19世纪中叶以后,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心力量的士大夫逐步分化蜕变,当此社会中心力量出现真空之际,当时最具现代性、组织化程度最高的近代军队,就在事实上充当了社会中心力量的角色。而当由士大夫分化和新式教育培养而来的知识分子建构起新的组织载体——政党——之后,社会中心力量的再次转换就成为必然。就群体或组织形态来看,从士大夫到近代军队,再由近代军队到政党,近代中国社会中心力量的两次转换,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最根本的变迁特征。

① 克里斯多夫·皮尔逊:《论现代国家》(第三版),第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二、从“羽扇纶巾”到“赳赳武夫”：社会中心力量的第一次转换

在既有研究中,人们常用“军阀”指称近代中国的军队,尽管这是因其带有浓厚的军阀化倾向导致的,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明显不同。一方面,“军阀”一词是一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义词,并不能用来指代近代中国众多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军阀只是掌握兵权的个体式精英,近代军队则是涵盖了人员、装备、训练管理等内容的综合性军事组织。因此,用更中性、含义更准确的“近代军队”来表述暂时充当士大夫和政党之间的“社会中心力量”更为合适。

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是中国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无法逾越的一环。所谓现代化,是指“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并“更换了人们认为不再适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的过程^①;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就是传统中心主义国家逐步实现向现代中心主义国家演进的过程。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②而“政治现代化是在任何所有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最急要的工作”。^③事实上,近代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既能重建历史自信又能提供现代社会基础的权威形态,^④近代军队正是构建这一“权威形态”的第一阶段的获胜者——一种僭越的社会中心力量,而这一切是从士大夫的分化蜕变开始的。

(一) 士大夫分化蜕变与近代军队崛起

所谓士大夫,是士与大夫的统称。在先秦时代,士“兼含‘大夫’在内”,“帝国时代的士大夫之名,就是从封建时代的士与大夫那里承袭而来的”^⑤。两者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否正式取得官职,但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就是说,士大夫是一个共享知识、价值观与特权的整体,即便皇帝也可视为其中一员,即“天子者,大士也,士者,小天子也”。^⑥ 本文就以士大夫指代传统中国以自身素养而主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阶层——传统中国的社会中心力量。

可以说,士大夫是中国超大型人本社会的产物。钱穆认为,人本社会即“以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若“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向这两条路迈进”,即“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违背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⑦ 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人本社会,必须有一个社会的重心,作为凝聚人心、团结人民的纽带,也即‘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社会才能够和谐稳定。”^⑧ 因此,作为知识的创造与传承者,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和一定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垄断者,说士大夫是传统中国的社会中心力量,基本是不言自明的。^⑨ 其最大贡献,就是建构并维系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帝制中国达两千年之久,即皇帝—士大夫联盟居于统治地位的“自治政治中心的定型化”是帝

① 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第19、2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蒋廷黻文存》,第4页,华龄出版社,2011年版。

③ 蔡文辉:《中国现代化综合理论之建立》,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292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④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6.

⑤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48、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⑥ 《李源澄集新编(一)》,第18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⑦ 钱穆:《国史新论》,第29页、第31—32页、第57页。

⑧ 王续添:《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与“中国政治模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

⑨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制中国的基本特点。^① 但 19 世纪中叶以后,士大夫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化蜕变。

1. 士大夫的分化蜕变。政治学家钱端升认为,中国的文官政府传统在 1907 年军谘处设立时被打破:“军事机关开始独立于文官政府,并最终会将其支配”。^② 这固然是一个标志性节点,但士大夫的分化蜕变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首先,书生领兵和洋务运动是士大夫的“回光返照”。乾嘉之际,“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因寄轩文二集·卷一》),太平天国运动为士大夫的“最后荣光”提供了契机,从团练到湘淮军,他们完成了由书生向军政领袖的转变,发起洋务运动更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程。其次,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促进了士大夫的分化。围绕着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士大夫很快分化为洋务派和清流派,后来又演变为维新派和顽固派。这种分化显然是对传统社会中心力量的削弱,但也为其由士大夫向近代军队的转换创造了条件。再次,新式教育发展加速了士大夫的蜕变。新式学堂在很大程度上抢夺了儒家思想的受众,读书人开始接受记者、医生、工程师等新兴职业,还出现了一批辞官不做的人。于是,“19 世纪后半叶,在中国沿海城市,士大夫的传统政治已经开始解体……权力和社会地位不再只是为那些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群体所拥有”。^③ 可以说,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士大夫分化蜕变,最终促成了作为士大夫生成机制的科举制在 1905 年的废除。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心力量的士大夫,遂在整体上正式告别政治舞台,走向了历史的终点。

2. 近代军队的崛起。近代军队和近代知识分子都是伴随着士大夫的分化蜕变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出现的新型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是社会现代化的推动者,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1895 年一般被视为他们产生的元年。一方面,“公车上书”突破了不许士人上书言事的禁条,成立了强学会,孙中山等人也在海外成立了兴中会;另一方面,袁世凯开始编练新建陆军,选拔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各级军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由此启动。这表明此前零星出现的知识分子和近代军人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组织化进程,并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从全世界来看,军队在现代国家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就中国而言,这当然是国内局势动荡和外来侵略加剧的结果,但也与社会力量对比和近代军队的发展密切相关。早期知识分子曾有机会与近代军队一争雄长,但社会基础薄弱和组织化程度不足使其未能成功。当时的知识分子数量很少,多局限于社会中上层,影响力集中在舆论领域;并且革命派知识分子所依靠的,主要是难以取得大众理解与认同的会党。因此,早期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作为其组织形式的主要由学会发展而来的早期政党,基本是对西式议会政党的仿造,而中国却缺乏开展西式政党政治的基本条件和共识;同时,它们缺少严格党纪约束,组织化程度较低,这在欧美国家不成问题,但在中国却难以集中力量,发挥应有作用。就近代军队而言,组织化程度提高和自主性发展是其崛起的关键。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因缺乏组织性而陷于一盘散沙,而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中国近代军队“非纪律不行,军纪非严肃不立”^④,高度组织化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自主性发展推动了近代军队支配国家意识的形成。工具化的军队本不应有自主性,但士大夫蜕变和整体性退出历史舞台,导致既有的主体性约束消失,新的主体性约束尚未出现,近代军队一时间“竟成了天地间无主之物”,“无目的,无主宰,完

① S. N. 艾森斯塔德:《“轴心文明”比较研究的两个案例:拜占庭帝国与中华帝国》,《社会理论的诸理论》,第 300—301 页。

② Ch'ien Tuan-sheng,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inese Government”, *Pacific Affairs*, Vol. 21, No. 3, 1948.

③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第 178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版。

④ 《蒋百里全集》,第 1 卷,第 80 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全失去其工具性”。^①可以说,军队自主性发展是对国家自主性的“僭越”。当各方“没有在用何种政治制度来取代专制君主制的问题上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意见”^②时,近代军队遂凭借武力暂时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心力量。这就印证了美国政治学者派伊(Lucian W. Pye)的论断:在新兴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西化知识分子一般会被军队所取代。^③表 1 就是近代军队暂时成为社会中心力量的一种反映。

表 1 1860—1928 年间省级主官文武比重表

类 别 \ 时 段	1860—1900 年	1900—1912 年	1912—1928 年
文官(单位:人)	214	81	136
军人(单位:人)	4	14	197
其他(单位:人)	12	2	7
总计(单位:人)	230	97	340
文官比重	93.04%	83.51%	40.00%
军人比重	1.74%	14.43%	57.94%

说明:1. 表格均由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2. 省级主官指清代督抚,1912—1928 年的都督、督军、督办与巡按使、省长等。
3. 1860—1900 年的督抚数据未排除重复者,其他数据已做排除。

3. 近代军队的过渡性特征。作为影响中心主义国家变迁的核心自变量,社会中心力量的自身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暂时充当了社会中心力量的近代军队,由于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显现了一系列过渡性特征,而这反过来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心主义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

具体来说,在理论上,传统士大夫共享一套儒家价值理念,近代军队则基本停留在唯利是图、唯力是视的层面。在组织化程度上,传统士大夫属于个体式精英,基本没有组织化;近代军队的组织化程度则处于较高水平。就精英吸纳而言,士大夫阶层因科举制源源不断地吸纳社会精英并受到了广泛欢迎;但参军除了在新军初创时受到欢迎外,多数情况下不仅没有吸引力,反而被视为畏途。^④就组织性而言,士大夫虽没有组织化网络,但科举制却使其充盈于整个国家政权组织中;近代军队虽有较高的组织性,但因地方性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就社会互动而言,近代军队与社会关系更为密切:传统军队局限于身体对抗,战争几乎是其唯一职能;近代军事教育则带动了专门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工业化创造了条件。^⑤同时,传统影响的弱化与外来影响增强,共同塑造了一支具有更强身份认同意识、更强行动能力以及更大话语权的自主性军队,使其更频繁地介入政治活动。总之,正是这些特征使近代军队既区别于士大夫和传统军队,也与此后的新型政党有着显著不同,并由此塑造了一个过渡性的中心主义国家。

(二)近代军队主导的第一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

如果说士大夫主导的帝制中国是传统中心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现代中国是现代中

① 《梁漱溟全集》,第 2 卷,第 464—465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②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 9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③⑤ Lucian W. Pye, “Armie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John J. Johnso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9, pp. 74—75.
④ Morton H. Fried, “Military Status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7, No. 4, 1952.

心主义国家,那么由近代军队和国民党主导的近代中国就分别是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相同点在于近代军队在此过渡时期发挥了社会中心力量的主导作用,不同点在于第一阶段体现出近代军队主导作用的绝对性,第二阶段则有一个形式上的政党中心,更凸显了社会中心力量从近代军队到政党的过渡性。对于近代军队主导的第一阶段中心主义国家从传统到现代演进的过渡性,可从其构成要素即中心主体、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四个维度加以分析。

传统中国的中心主体是士大夫,他们将自己的学说整合为形塑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出一套皇帝—士大夫主导的传统单一制体系,由此实现了中央直接治理和基层间接治理的结合。当士大夫分化蜕变后,传统中心主义国家由于中心主体缺失开始逐步消解,如何建设新的国家遂成为新的社会中心力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近代军队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重要源头,但它并未放弃由其主导构建中心主义国家的诉求。袁世凯曾一度带来国家统一的某种希望,即便其死后,“武力统一”“中央集权”等口号仍反映了作为当时近代军队主要力量的北洋军构建由其主导的中心主义国家的坚持与努力。但近代军队的工具属性和过渡性使其力量不足,思想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他们不仅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相应的能力,也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和路径,因此,它所维系的就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

从中心主体来看,近代军队的特殊性和过渡性使中心主体存在严重缺陷,这直接影响了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成效。首先,军队的特殊性使其无法处理好军事以外的其他事务。“军人思维通常狭隘且不负责任。他们可能是专家,但专业知识却阻碍其对军事以外的利益给予应有的重视。除非处于适当位置,军事力量通常会横行霸道,带着国家走”。^①这是所有军队的通病,近代中国军队当然不例外,并且“带着国家走”的程度更深。其次,尽管军队的组织化程度高于士大夫,但其自身过渡性却造就了一个力量分散、地位不稳的暂时性中心主体。一方面,“武力统一中国不难,倒难在谁来统一武力”^②;另一方面,军中不仅存在逃兵现象,而且兵变频发^③,极大限制了中心主体的政治权威性和领导作用的发挥。因此,尽管近代军队成了新的社会中心力量,但因自身缺陷,其力量虽相对强大,却不足以统一全国,更不足以有力地推动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而只能以一种暂时的替代性角色呈现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中。

就中心理念而言,近代军队处于一种半传统半现代的状态:虽有现代化技术装备,却没有先进思想指引。袁世凯的建军原则是“封建宗法思想加上外国军事技术”的“中体西用”^④,“一切教育以忠君爱国为本原”^⑤,严禁民主、自由等现代思想传播。当时南方各省军队虽受革命影响较深,但也仅停留在“排满”和“共和”层面,真正具有较为系统的现代观念的是极少数,能坚持的就更罕见。事实上,“军官集团只有在其忠诚于军事理想的情况下才是职业化的……只有在被军事理想所激励时,军事力量才会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而文官控制也能够得到保证”。^⑥近代中国显然不满足这种条件。除行伍出身外,近代军队还有留学生和国内军校生,但专业知识不过是他们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思想上并未超越“中体西用”,零碎的现代思想不可能支撑起真正的“军事理想”,更不可能发展出先进理论。他们只是根据现实需要,在传统与现代混杂的思想

① 钱端升:《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第177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②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65页。

③ 《民国以来一百七十九次之兵变》,《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一号,1923年1月10日。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前言第3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⑤ 《大清新法令(点校本)》,第3卷,第57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⑥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第65—6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拼盘中找寻只言片语,作为维护自身利益、伺机发展壮大的口号。于是,“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① 因此,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心理念的实际缺失,不仅使近代军队无法充分吸纳社会精英,实现对民众的思想引领,还使其所主导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失去了明确的前进方向。

从中心制度来说,一方面,纵向结构的单一制是中心主义国家的主轴制度,中国的传统单一制体现为皇帝-士大夫主导的传统郡县制;由于近代军队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局限,故其主导的单一制就体现为承袭传统制度基础的摇摆分裂的省县制。民国初年,废省论、军民分治等主张盛行一时,但前者未得到有效贯彻,后者也有名无实。而由于地方自治的推行和联省自治的出现,联邦制一时间甚嚣尘上,故此时央地关系的制度选择又表现出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的摇摆性。另一方面,清代基本由文官出身的督抚负责地方政务,民国初年的军民分治则旨在让文官摆脱军人干扰,但实际上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反倒强化了军事权力的独立和对文官权力的侵夺;同时,由于中央权力有限,传统的“以文制武”变成了“以武制文”,军阀割据极大地破坏了名义上的中央集权和国家通过社会中心力量实现对军队的统一领导。除袁世凯尚能统驭地方,“各省亦多能解款至中央”外;此后“中央遂无任命省长之能力”,“督军既握军民两政大权,故实际与小国王无异”,以至形成“一省专制”的局面。^② 这种状况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有某些相似之处,故此时的单一制又表现出明显的分裂性,国家的领导军队制度也遭到破坏,体现为“军阀领导军队”的局面。

就中心过程来看,传统中国推行的是中央直接治理与地方间接治理的结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关系简单,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不十分复杂。因此,尽管存在舞弊盘剥,但总体来说,这种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纵向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也能得到民众的接受,并保持长期稳定运转,只是在王朝更迭时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不过很快又得以修复。但近代军队主导下的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民国建立后,无论军政民政,都由军人(军阀)掌控。大军阀统治省、小军阀统治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他们对于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往往以武力行事,既不需要乡绅协助,也不按既有规章,甚至派兵干预。^③ 韦伯(Max Weber)指出,权力是十足的统治,权威则基于民众的服从^④;而服从则来自中心过程的表现。事实上,大小军阀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心主义国家的纵向治理结构。因此,相对于士大夫,近代军队虽“从间接走向了直接”,但显然算不上真正的治理,而只能是为民众普遍厌弃和反对的粗糙统治甚至是暴政。可以说,近代军队主导的中心过程总体上是失败的(表 2)。

表 2 士大夫与近代军队主导的中心主义国家比较表

要素\类别	传统的中心主义国家	第一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
中心主体	士大夫	近代军队
中心理念	系统的儒家思想	拼盘式的“中体西用”
中心制度	皇帝-士大夫主导的郡县制及其对军队的领导	近代军队主导的摇摆分裂的省县制和“军阀领导军队”
中心过程	中央直接治理与地方间接治理相结合	无序的初步直接“治理”

① 《蔡和森文集(上)》,第 112 页,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② 鲍明钤:《中国民治论》,第 61—62 页,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
③ 贵州省仁怀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仁怀县文史资料第 6 辑》,第 72—73 页,内部发行,1989 年版。
④ 奥勒姆·戴尔:《政治学与社会学》,第 46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可见,近代军队虽有构建中心主义国家的强烈意愿,并付诸某种努力和尝试,但囿于自身局限与不足,仅扮演了一个过渡性角色;这种暂时性的社会中心力量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转型中的中心主义国家的构成要素既不健全也不强大,相互间的联系更不顺畅有效。因此,中央政府就无法动员足够的资源从事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的国家也毫无权威可言。^①

(三) 近代军队对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两面作用

作为暂时性和过渡性的社会中心力量——近代军队尽管在客观上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某些发展和进步,但也造成了深重灾难。可以说,它对近代中国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既助推又阻碍的两面作用。

从助推意义上看,近代军队既加速了传统国家的消解,又助力了现代国家的产生。近代军队首先,消解了传统社会结构和忠君爱国观念。传统军人大多目不识丁且地位低下,近代军人不仅有读书人,还有军校生和留学生,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也逐步演变为五民结构^②。而且随着现代文明的传播,国民是主权者,军队是“国民之棋子”、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国家全体之保障”等观念越发深入人心,^③君主的神圣性遂被国家取代。其次,近代军队不仅推翻了旧王朝,还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正所谓“帝政告终……共和成立……微我军人,曷克臻此?”^④再次,尽管军人主政,但民初国会选举较清末咨议局选举要进步得多,政党竞选、天坛宪草及地方自治等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再次,近代军队在自身发展和抑制外敌的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现代化。有西方学者认为,到1910年,中国“已成功地建立了与西方和日本相匹配的大规模的新式军队”,迫使列强“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巧取豪夺的行为有所收敛”。^⑤新技术与装备的引入及军事教育的推广,不仅作用于军事领域,还带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最后,客观上,军阀割据局面为新的社会中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就此分析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⑥

就阻碍作用来说,近代军队一方面延缓了传统国家的崩溃,另一方面又迟滞了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就前者而言,近代军队以对内镇压为要务,从镇压义和团,到镇压各地民变和革命党起义,新军一直是主力。蒋百里曾尖锐指出:“中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内”,近代军队是“政府之私用物”^⑦,这显现了近代军队维系传统国家的基本功能。当传统国家在形式上终结后,近代军队不仅没有及时清理其残余思想,反而为其俘获^⑧,这就使传统国家得以在思想领域继续存在。近代军队畸形发展所催生的军阀割据,不仅加重了人民苦难,还破坏了本就羸弱不堪的民初政党政治,造成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工具化和边缘化。自袁世凯当权,没有哪一届内阁是真正的政党内阁,国会更屡遭摧残,大大小小的政党很快依附于军阀,成为为其摇旗呐喊、装点门面的工具。即便当时的国民党,也难有大的作为。所以,近代中国“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⑨梁漱溟更将“社会上无阶级集

①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pp. 8—9.

② 《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35页。

③ 《蓝天蔚年谱长编》,第610—611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蒋百里全集》,第1卷,第77页。

④ 《黄兴集》,第25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 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第16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 《蒋百里全集》,第1卷,第77页。

⑧ 《张勋等又联电争孔教》,《申报》,1916年10月18日。

⑨ 邱昌渭:《议会制度》,序,上海书店,1991年版。

团势力可为中心,武力逐无可属”列为“国家权力建立不起”和“政治无办法”的重要原因。^①因此,作为暂时性的社会中心力量,近代军队面对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由表象上的“心弱力强”造成了实际上的“有心无力”;它不仅没能有力地推动这一进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阻碍者。

三、从“以军驭政”到“党指挥枪”:社会中心力量的第二次转换

近代军队不能有力推动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就要被更新的社会中心力量取代。这就是由经过民主共和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组成的新型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新型政党的出现,使近代中国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变迁构成了完整的链条:士大夫主导的传统中心主义国家→近代军队主导的第一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国民党主导的第二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共产党主导的现代中心主义国家。其中,第一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和第二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是该进程中的过渡形态。在社会中心力量的第一次转换中,可以说,近代军队是士大夫的唯一替代者;而在社会中心力量的第二次转换中,国共两党几乎同时起步的社会中心力量的合作和竞逐是本次转换的焦点,两党在近代军队向政党转换过程中显现出过渡性和完成性的差异和接续。

(一) 军人社会形象的转变与新型政党的崛起

与士大夫的分化蜕变不同,尽管存在内在缺陷,近代军队并未很快出现衰败迹象,反因现代化程度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力量。与此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展,知识分子更新迭代,队伍逐步壮大;大众的自主意识在觉醒,力量也在增强,这种双增强趋势的反映就是军人社会形象的转变,即社会对近代军队观感的普遍恶化。新型政党就是在此背景下崛起的。

1. 军人社会形象的转变。社会中心力量需要赢得民众普遍支持,才能保证地位稳定,进而构建并维系中心主义国家。士大夫正是如此,但近代军队却达不到这一标尺。近代军队确曾给习惯了“好男不当兵”的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装备外国武器,穿着新式制服,而且还有军乐队……令人肃然起敬”。“大家的心理开始转变了……我们必须尊敬士兵和军官。从此以后,只有好男才配当兵。”^②这种对军人的赞誉在辛亥革命时达到顶峰,“志士”“伟人”等^③几乎成了那时军人的代名词。

但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使这种观感很快改变。“新军将领们对满清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他们已经尝到权势的滋味……结果你抢我夺,自相残杀起来”。“一度被鄙视,后来受尊重的军人,现在又再度被人鄙视了”。^④“伟人”“志士”等美称遂为中性的“武人”所取代。袁世凯死后,护法战争又起,北方军队的内部矛盾使其无法像二次革命那样击败南方军队,于是南北再度分裂,直到1928年北伐完成。在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孙中山等先后开始用带有明显贬义的“军阀”指称近代军人,“在自由知识界学人当中”,胡适也于此时弃用“武人”改用“军阀”。^⑤思想界正是从五四前后军阀的种种负面表现中,得出了对军阀的

①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21页。

②④ 蒋梦麟:《新潮·新潮》,第111页,第112—113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③ 《张謇全集》,第2卷,第373—37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⑤ 徐勇:《试论李大钊在“军阀”概念及其研究中的理论贡献》,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第229—24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否定性认知。^①“军阀”由此成为拥兵自重之近代军人的专属称谓,这预示着近代军队主导的第一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统治危机的到来。

2. 新型政党崛起与“打倒军阀”。新型政党与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关系密切。新文化运动不仅广泛深入地传播了现代思想,还培育了大批激进的新型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则破除了他们对西式政治的迷信,使其对现代政治的认识更深刻,视野更宽广。在五四运动的初次登场后,部分新型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另一部分则成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同路人。此时,国共两党在“打倒军阀”并承担社会中心力量重任的问题上也有了共同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认为,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解决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为此,中共二大正式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并指出“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②要实现该目标,就需要“一个纪律严密、主张明确的党”,“倘若不然,中国所谓改造社会的,将永做不出一点功效”^③。此时,中国共产党虽是先进的新型政党,但毕竟力量孱弱,还不能适应和满足中国“革命之需要”,而当时“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于是,共产党决定以国共合作的形式推动国民革命,并视改组后的国民党为“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④

经历了多次挫败的孙中山也日益认识到“武人政治”之害。他在护法之初认为,“中华民国一厄于袁世凯,再厄于段祺瑞,遂致完全成为武人专横之时代”。在他看来,“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⑤因此,“欲谋根本救国,仍非集吾党纯洁坚贞之士,共任艰巨,彻底澄清不为功”。在与苏俄接触中,他更坚定了“再来一次革命,以扫荡这些当权集团”^⑥的认识。但国民党“组织未备、训练未周”,“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为此,孙中山表示“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而只有“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他指出,“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即“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以主义征服”民众。^⑦可见,正是在与军阀的联合与斗争中,孙中山才认识到了其危害性,坚定了通过再造国民党为新型政党来再造国家的决心。

因此,国民党改组意味着国共两党在“打倒军阀”开展国民革命问题上形成了基本的共识。此后,通过广泛的革命宣传、引入党军体制、创办黄埔军校等举措,新型政党不仅建设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还打造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至此,近代军人主导的第一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政权宣告终结。

3. 新型政党的现代性特征。从社会中心力量上看,以当时实行合作的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新型政党实现了对早期政党和当时军阀化军队的超越,其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理论

① 翁有为:《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之认识》,《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②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42页,第62页,第146—147页,第1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3、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⑤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第207、471页,2006年版。

⑥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6、285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⑦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7—268页,第429—430页,第430—43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基础上,新型政党有系统的现代化指导思想,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组织化程度上,新型政党组织结构更严密、党纪约束更严格,组织化程度比近代军队更高;在群众基础上,新型政党不仅重视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吸纳,中国共产党更注重对工农大众中先进分子的吸纳,“入党”开始成为社会先进分子的表现;在分布范围上,新型政党不仅不是分裂的地区性政治团体,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在政治目标上,新型政党不以选举夺取国会多数议席,而以武力夺取政权,建立由其主导的现代国家;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新型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作为社会部分成员代表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代表者的身份引领和改造整个社会,进而重建国家。总之,新型政党以“主义”与“组织”的结合实现了组织对个人的超越:一方面以自己的指导思想打造合法性基础,争取更多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强化自身建设,增强党的力量,推动现代国家建设。

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如青年党以及后来成立的民盟等,虽也在部分方面具有了新型政党的现代性特征,但总体上与国共两党还有不小差距。因为并非所有的新型政党都是社会中心力量。实际上,新型政党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进而拥有主导性的强大力量。由此,新型政党一般可以分为中心政党和非中心政党。比较而言,前者社会代表性广泛、力量强大,后者社会代表性狭窄、力量弱小。可以说,中心政党的出现与发展顺应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性变革,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

(二) 国民党主导的第二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事集团,一度让人以为政党取代军队成为新的社会中心力量。但国民党“清党”迫使共产党独立开展革命,军队势力膨胀又使国民党未能摆脱“以军驭政”的窠臼,这就使国民党主导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并未实现对此前的全新超越,仅是一种半政党半军队的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即政党和军队的中心地位是一种“二元”性的存在,是社会中心力量从近代军队到政党的过渡阶段。与第一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相比,此时虽有一个居于政治中心地位的政党,但更多是形式上和名义上的中心,军权至上的状态并未改变。这仍可从“四个中心”维度加以检视。

从中心主体看,尽管改组后的国民党多方吸纳党员并健全组织架构,但一系列内部问题的存在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国民党发展党员贪多求快,往往采取集体入党、强迫入党的方式,故挂名党员的情况十分普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① 另一方面,国民党虽建构起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系统,但上下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组织建设却有很大差距,以至于“上层有党,下层无党,都市有党,乡村无党”。^② 国民党纪律弱化的问题同样严重:“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国民党除了几条具文的纪律而外,泥的纪律也配不上”。^③ 蒋介石坦言:“各地党部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基本的训练和严肃的纪律……平时不能训练党员,使党员服从党纪,徒然有一党部,有什么用处呢?……党员大多数还不明白党的基本组织是什么,不注意下层的基本工作,弄得党在民众中间不能引起什么影响”。^④ 因此,国民党并不能充分发挥中心主体的应有作用,尤其是无法将广大工农群众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4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6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第137页,1991年版。

④ 张其成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24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吸引到自己旗帜之下。

从中心理念看,三民主义既不为党员忠诚信仰,代表性又越发窄化,无法获得民众普遍认同。一方面,国民党为强化党员和民众对中心理念的认同,要求“吸收对于三民主义有忠诚信仰之各方人才”,并编制党义教科书,强化党员训练,^①但“论党策说主义的文字流为陈腐拘泥的成套”,并“得了‘党八股’的讽刺”^②,以至“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国民党“不但丧失了党魂,几乎连躯壳也不复存在”。^③这样的党员当然谈不上信仰忠诚,党组织更没有什么凝聚力。另一方面,国民党虽自称“既不代表资产阶级,也不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只是代表全民”,^④但“一定时间,一定社会之下……想要得到全体人民的同意,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基础确实是很薄弱的”。^⑤于是,“革命势力涣散,党权没落……民众由信仰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了”。^⑥中心理念无法获得党员信仰,代表性又越发狭隘无法为民众所认同,这显然是对中心主义国家构建的致命打击。

从中心制度看,国民党一方面在央地关系上建立起一种形式上的现代单一制,实际上却是由军队与政党共同主导的“变形走样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治的单一制”^⑦;另一方面在领导军队制度上虽树立了政党中心,但党权仍为军权所俘获,无法走出军权至上的怪圈。北伐后,主抓国民党党务的胡汉民具体设计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基本框架:“所有军政训政……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⑧,《训政纲领》即照此制定。但“党权高于一切”^⑨的原则在北伐前即遭破坏,北伐后更是军权凌驾于党权之上。胡汉民当时就认为,北伐“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即“没有党治,只有军治”。^⑩九一八事变后,黄埔系军人开始鼓噪“把政治、党务、军事附托一个……负责的领袖”,改民主集权制为总裁制。^⑪这种党内独裁制——总裁制1938年后开始实行,而有权处理党政军一切事务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也随之设立。这看似强化了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事实上只加强了蒋介石以军权为核心的个人权力。同时,国民党虽试图构建文官政府,但即便抗战前文官省主席也不多见;抗战中战区长官兼任省主席后,军队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因此,国民党虽标榜实行民主集权制^⑫,但不仅在党内没有做到,在国家制度上更没有做到;看似以党治国治军,实际上却无法掌控军队。在胡汉民看来,不过是躲在“三民主义的牌号之后,施展其一切军阀的行动”。^⑬

从中心过程看,国民党实现的是一种不彻底的纵向直接治理,即虽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权机构,行政过程及效果却没有太大变化。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虽完善了县的职能,但并未在县以下设置相应的政权机关。推行保甲制,特别是新县制后,国民党才真正建立了县—区—乡镇—

① 叶溯中:《强化建国的中心力量》,《民意》(汉口),1938年第16期;符杰:《强化抗战建国的中心力量》,《统一战线》,1938年第6期。

② 《钱端升全集》,第10卷,第2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 张其的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215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④ 王辛味:《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民国日报·星期评论》,1928年国庆纪念增刊。

⑤ 萨孟武:《如何增厚党的力量》,《时代公论》(南京),1932年第4期。

⑥ 秉乾:《中国革命中心势力的检讨》,《前锋》(镇江),1929年第7期。

⑦ 王续添:《现代中国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选择之比较——兼论现代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下)》,《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⑧ 《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第411、41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

⑨ 罗家伦等主编:《革命文献》,第10辑,第1页,正中书局,1957年版。

⑩⑪ 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第353、426、353—3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⑫ 范吾:《中心人物与中心力量的必要》,《汗血周刊》,1933年第14期。

⑬ 胡汉民:《纪律问题决议案》,黄彦编注:《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村的纵向治理体系。虽然县和乡镇都是名曰自治的“法人”,但县长由省主席任命,实践中更是“国家行政之大任……悉加诸乡保肩上”。^①这种治理虽“有能力把权力伸延入村”,却“缺乏直接派任领薪人员入村的机器,而必须通过庄内的人来控制自然村”;^②即国民党虽建立了纵向的直接治理体系,但人员依旧是从前的乡绅。这种治理不仅导致了政权内卷化,还“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地位”。^③正如有政治学者指出,20世纪上半期,“国民党政权的乡村治理是‘无根的统治’”。^④全国抗战的爆发和蒋介石的不当处置更加剧了“中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以至“蒋介石从未能够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和高效率的政府”。^⑤尽管他高喊“党政军民全体动员一元化”,^⑥实际上却难掩其中心过程的失败。

由此,国民党所代表的社会中心力量第二次转换并未完成:尽管它构筑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⑦,开启了政党作为社会中心力量领导现代国家构建的时代,但其在自身建设以及中心理念、中心制度与中心过程等方面始终存在无法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党军关系问题上,未能实现对以北洋军事集团为主体的近代军队的根本超越。这当然有抗日战争的影响,但党军关系的摇摆显然是更根本性的因素。国民党的软弱无力,使其无法完成对国家与社会的系统化整合,对社会与国家的领导权就处于弱化状态。与社会中心力量的第一次转换相比,社会中心力量的第二次转换因其半政党半军队的二元色彩,显现出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鲜明过渡性,但不可否认,这种过渡也的确前进了一步。

(三) 共产党主导的现代中心主义国家

遵循上述逻辑,所谓现代中心主义国家,就是由现代社会中心力量——政党主导的中心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现代中心主义国家是在1949年后逐步形成的,但在此前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就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中国的党军关系失序问题,实现了政党对军队的根本制约抑或绝对领导;同时,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伊始就发现了“人民”的价值,广泛动员和组织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真正树立起政党的社会中心地位,从而为实现由其主导的现代中心主义国家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仍可从“四个中心”维度做如下审视:

就中心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强化自身建设以担负中心主体的重任。毛泽东把“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缺乏革命中心力量”视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⑧。此后,党意识到“无产阶级……应以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这种领导权“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⑨为此,就要强化党的自身建设。一是严格发展党员,既强调组织入党,更强调思想入党。^⑩二是强化组织建设,

①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571—5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②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389—39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13—314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67、2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第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⑤ 邹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 《蒋中正日记》,1945年11月20日,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版。

⑦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13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⑨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建立完善严密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加入第三国际,接受并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强调“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①,到1927年已在全国建立起比较完备严密的五级党组织。^②三是正确处理党与政权的关系,不仅保障了党的领导的切实有效,还保证了党的肌体健康。到1945年,“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③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最终使其所主导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即中国现代化重建立于不败之地。

就中心理念而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为中共党员的坚定信仰,党的力量因而集中强大,其代表性又越发广泛,从而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就前者来说,党员之所以信仰坚定,一是慎重发展党员,并且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二是党内形成了不断学习并纠正错误思想的机制。对党员而言,努力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是党章内在要求;而“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也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坚定理想信念;整风运动更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地团结起来”。^④就后者来说,党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是因为:党成立之初,强调“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随后主张“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⑤但大革命失败又使其“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⑥;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自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在排除极少数大官僚大资本家后,“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⑦由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更加明确了行动方向,还获得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是此时的革命主力,还是此后巩固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⑧这就在客观上成为中国共产党赢得竞争胜利、重建现代中心主义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就中心制度而言,相较于国民党仅建立起形式上的现代单一制,中国共产党则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单一制,即民主集中单一制。共产党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国家制度上也真正实现了民主集中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党组织牢牢扎根于基层社会,遍布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将民主集中制自上而下应用于从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再到解放区民主政权各类各层级新型政权建设中。同时以党团(即后来的党组)形式内嵌于政权及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以实现党的直接领导。在领导军队制度上,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意识到“武力……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⑨,此后更逐步建立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⑩的领导体制: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⑪,从而根除了晚清以来军队私属性和自主性的恶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1952—1954年间各省文职政府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0页,第90—91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42—1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0、210、319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115页。

⑥ 冯文彬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1921—1991)》,第6卷,第45—4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159页。

⑧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289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第4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⑪ 《组织工作文件汇集》第2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第53页,1980年版。

建立”，军队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大大减少。^① 中国共产党的建军、领军和驭军，标志着政党真正实现了对“集中强制的”暴力工具^②的根本掌控和制约，也意味着晚清以来文武失序状态的历史性终结，现代化以文制武的军政关系正式形成，政党取代近代军队成为真正的现代社会中心力量。

就中心过程来说，中国共产党创造出的一套深入民众的直接治理模式，不仅在央地关系上贯彻民主集中单一制，而且在治理过程中也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和基础较好地区所建立的县委、分区党委、村支部等基层党组织，使其纵向治理结构越发完善，在基层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③ 相较于国民党对基层组织的忽视，共产党的“低层机构”^④保障了政治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解决了国民党未能解决的纵向治理难题，从而为共产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实支持。在此过程中，群众路线也为中国共产党发现和组织“人民”创造了根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强调，无论中心工作或其他工作，党都要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即先形成领导核心，再使“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⑤ 归根结底，共产党人“无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의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⑥，而这正是国民党所不能也无法做到的。至此，国共两党中心过程之成败也就一目了然了（表 3）。

表 3 国民党与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心主义国家比较表

要素\类别	第二阶段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	现代中心主义国家
中心主体	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
中心理念	三民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心制度	政党和军队主导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治的单一制以及形式上的以党领军	民主集中单一制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心过程	不彻底的直接治理	深入民众的直接治理

中国共产党取代中国国民党，成功实现了近代中国社会中心力量的第二次转换，也由此实现了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重建，即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建设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打造“低层结构”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现代中心主义国家，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凸显了与所谓经典的现代国家构建路径的明显不同。可以说，国共两党的社会中心力量之争显现了两党理念和代表性的根本对立，更彰显了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必然的历史逻辑，体现出社会中心力量现代性的层累递进和迭代更新。

四、结论：从中国历史演进到现代国家理论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是先行者，但决非垄断者。事实上，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发展

① Harry Harding,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inese Politics”, in Victor C. Falkenheim,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 p. 219.

②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 1 卷，第 3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③ 《栖霞县志》，第 460—462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④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 218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97—899 页。

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60—61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

不可能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①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囿限,日益关注非西方社会各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构建经验,尤其要从中国历史演进进来重构现代国家理论。

从中国历史演进来看,从无组织的士大夫到组织化的近代军队再到高度组织化的新型政党——近代中国社会中心力量的两次转换表明,“中国政治问题从地方是‘统’不起来的,必须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解决中国政治的全局问题,首先在于纵向轴的努力和建设,尤其是社会中心力量即中心主义政党的建设和锻造”。^②正是沿着这条主线,近代中国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虚弱的平衡”^③,找到了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的现代国家之路,即从传统中心主义国家到现代中心主义国家的演进路径,而这一经验对当下乃至未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不无裨益。

从现代国家理论来看,既有研究成果大多聚焦欧洲,并不能“充分说明欧洲之外新兴独立国家的形成”^④,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理论则建立在对社会环境和国家构建各环节的具体分析之上。作为最具能动性的核心要素,社会中心力量自然使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发生相应转换,进而推动了中心主义国家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演进。可以说,对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历史逻辑的理论阐发,是在结合人类政治发展史的基础上,主要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⑤,由此为理解现代国家构建路径的多样性和普遍性,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认识。

总之,在由社会中心力量转换推动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变也有不变,变的是由君主官僚制转型为民主共和制,不变的是中心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属性。作为近代中国的内生性演化,这一分析路径既非冲击-回应式的外生性解释,也并非仅能自圆其说的“好玩”的空洞理论^⑥,而是透过对历史的考察,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和机理出发,找寻中国政治的变迁轨迹。这不仅为理解中国政治尝试给出一种贯通式、整全性的新解释,而且为现代国家理论的深化乃至重构提供了某种新的思考。

作者:王续添、辛松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100872)

(责任编辑:孟令梅)

①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序言第2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② 王续添:《从“国家”到“地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中的“战略退却”——对五四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关系的一种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

③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291页。

④ 罗伯特·E. 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第8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4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⑥ 《吴恩裕文集》,第2卷,第11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